從「第三世界」到「全球南方」
——中國對外政策的視角

任晶

202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八十周年。1945年聯合國成立之時，成員國不過五十一個。到了八十年後的今天，則已達到193個，基本囊括了世界各國。這些林林總總的國家，相互之間差異很大。就發展水平而言，有較發達的國家，有相對不那麼發達和不發達的國家。關於前者，人們分歧不大；關於後者，因其為數甚眾，可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對這一類國家的稱呼，在多年間經歷了從「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到「全球南方」的演變。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政策的視角看，也經歷了從如何看待「第三世界」到如何對待「全球南方」的發展過程。本文旨在通過考察這一過程，探討中國對外政策的有關發展演變。

一 「中間地帶」和「三個世界」

二戰結束後，隨着戰爭的勝利和共同敵人的消失，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歷史性使命宣告完成，美國和蘇聯崛起成為公認的「超級大國」①。世界上分別以美蘇為首，出現了兩大陣營，即資本主義陣營（西方）和社會主義陣營（東方）。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隨即「一邊倒」地加入了社會主義陣營，成為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這一格局僅僅持續了十年左右。隨着接踵而來的中蘇關係破裂，中國成為世界格局中一支更為獨立的力量。從1960年代到70年代初，中國進入了與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同時對立、對抗的狀態。

從1950年代開始，亞洲和非洲的原歐洲列強殖民地獨立運動紛起，新的獨立主權國家不斷誕生，加上早在十九世紀大多就已獨立的拉丁美洲國家，共同構成在兩大陣營之外生存和發展的一大片國家。新生的中華人民

共和國在世界重大多邊外交舞台上，初次亮相於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該會議主要解決朝鮮半島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1955年，周恩來總理率中國代表團參加了在印度尼西亞的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此即通稱的「萬隆會議」。會議通過了「十項原則」，亞非多國依靠自身的力量走上世界舞台初試啼聲。新中國從一開始就認為自己屬於世界上的「被壓迫民族」並贏得了革命勝利，革命勝利後的中國應該支持和幫助世界上其他「被壓迫民族」實現獨立和解放。

不久，中國外交政策思想中先後出現了「中間地帶」和「兩個中間地帶」之說。1956年10月19日，在會見巴基斯坦總理蘇拉瓦底（Huseyn S. Suhrawardy）時，毛澤東明確提出在社會主義陣營和美國之間存在一個中間地帶。他說：「在這個地區的一邊是社會主義陣營，另一邊是美國。中間地帶從英國一直到拉丁美洲。……這個地帶包括三種性質的國家。第一類是擁有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國家，如英國、法國；第二類是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國家，有的已經取得民族解放，有的正在爭取民族解放，像你們就屬於第二類國家；第三類是在歐洲的不擁有殖民地的自由國家。」② 由此可見，「中間地帶」這個說法是着眼於兩大陣營之外的其他各國而言的。

1956年8月中下旬，毛澤東在修改中共八大政治報告稿時加寫道：「拉丁美洲各國的民族解放鬥爭勢必受到亞非兩洲的影響，而向前發展起來。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西方少數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的廣大的後方……」③ 後來，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被合稱為「亞非拉」，成為中國人耳熟能詳、朗朗上口的用語，支持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成為了中國對外政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成為了中國大學裏的一門專門課程。「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成為1960、70年代中國流行的官方語言和口號。

1950年代末，中蘇之間開始出現明顯分歧。隨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發生了一場大論戰。與此同時，在西方世界中，法國總統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反對美國的控制，並醞釀退出北約組織（NATO）。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改變了他原先關於一個中間地帶的提法，認為存在兩個中間地帶。1964年6月在會見外賓時，他將其表述為：「我們說有兩個中間地帶，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個中間地帶，歐洲、加拿大、澳洲、日本是第二個中間地帶。……這個話不是現在才講的，一九四六年就講了。那個時候沒有分第一、第二，只講了中間地帶，講蘇聯同美國之間是中間地帶，包括中國在內。」④ 這便是「兩個中間地帶」說法的由來。

然而，比「兩個中間地帶」更為通行的名稱是「第三世界」。當時任職於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研究室的陳雪英後來認為，「『第三世界』一詞，是50年代西方國家新聞記者最先使用的，指兩大陣營之間的一大片國家。後來泛指擺脫殖民統治的廣大亞非拉國家。」⑤ 這樣講大體是不錯的，但更為準確地說，「第三世界」一詞是由法國人口學家索維（Alfred Sauvy）在1952年發明的。當時，索維試圖畫出一張冷戰之中各種聯合和聯盟地圖。第一世界由美國及其資本

主義的盟國（包括西歐、日本和澳大利亞）組成；第二世界由蘇聯及各東歐國家組成；第三世界則是世界上其他各國，主要分布於非洲、亞洲、中東及拉美地區⑥。此後，「第三世界」便作為通行的用語在世界上流行開來。例如，當時出版了為數眾多的以「第三世界」為名的著作，1979年還創辦了一直延續至今的專門學刊《第三世界季刊》（*Third World Quarterly*），等等。

不過，1950年代，中國較多地使用「亞非」及「亞非拉」等語，較廣泛地使用「第三世界」一詞在時間上略晚些。1970年代，毛澤東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之說，這一劃分中的第一和第二世界不同於索維的界分，但在「第三世界」的界定上則是一致的。

1974年2月，毛澤東會見來訪的非洲國家贊比亞總統卡翁達（Kenneth D. Kaunda），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一說。在與卡翁達談話時，他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⑦這樣，就出現了中國的「三個世界」新說法。這種劃分不同於「兩個中間地帶」的提法，但共同點是兩種劃分都是政治性的。4月，鄧小平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在發言中，鄧小平公開闡述了三個世界的劃分問題，「從國際關係的變化看，現在的世界實際上存在互相聯繫又互相矛盾着的三個方面、三個世界。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處於這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是第二世界」；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屬於第三世界。他還提出第三世界是反殖、反帝，特別是反對超級大國的「主要力量」。中國堅決站在第三世界國家一邊，中國永不稱霸⑧。

「三個世界」的劃分與此前已經出現的「第三世界」說相吻合，並順理成章地成為中國非常盛行的用語，且中國自我認同為「第三世界」的一部分。就當時中國的對外政策而言，當其把反對美蘇兩霸置於突出地位時，相應地也就強調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合作，甚至不顧自身的困難，投入巨大資源，作出重大犧牲，傾力幫助有關非洲國家建設坦贊鐵路，還向坦桑尼亞、贊比亞以外的多個國家提供援助，不切實際地超出了自己國力能夠承擔的範圍，到後來不得不作出調整⑨。

與此同時，在聯合國系統以及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國際金融機構內，為了便於進行某些必要的分類，也開始使用除「發達國家」（developed countries）以外的其他一些稱呼，其中包括「欠發達國家」（less developed countries）、「不發達國家」（underdeveloped countries）、「最不發達國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等。不過，考慮到後面幾種稱呼所指稱的國家的「面子」問題，為了婉轉起見，又出現了「發展中國家」（developing countries）一詞，泛指不屬於發達國家的諸多國家。曾經有人批評說，哪個國家不是在「發展中」（developing）呢？其實，這樣的批評是不明白「發展中國家」一語的來由，實為不得要領。

而在第三世界國家中，又出現了別的國家群體，「不結盟運動國家」就是其中之一。「不結盟」是相對於「結盟」而言的，印度、印尼、埃及等國並未與別的國家結盟，而此時的南斯拉夫則已被社會主義陣營「革出教門」，這些國家彷彿找到了共同語言，走到了一起。1949年10月17日，印度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闡述印度的政策時指出：「我們謀求和平，但決不依附某個大國或大國集團，而是要對每一個爭端和每一個問題有獨立見解。這些問題包括：爭取被壓迫人民的解放、維護各個國家及各人自由、消除種族歧視、消滅世界上大多數人目前所遭受的貧困、疾病和愚昧無知……」⑩這可視為不結盟運動的思想起源。1961年，第一次不結盟運動國家首腦會議在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萊德召開，制定了不結盟政策的目標和基本原則，後又相繼在開羅、盧薩卡、阿爾及爾、科倫坡、哈瓦那和新德里等地召開首腦會議。印度、埃及、印尼、南斯拉夫等國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根據曾任南斯拉夫外長的米尼奇(Miloš Minić)的說法，按照當時(1982年)的發展水平，南斯拉夫「同墨西哥一樣，屬於中等發達的國家」⑪。可見當時南斯拉夫等國在自我定位上就不同於其他很多發展中國家。

第三世界國家在戰後數十年間經歷了太多的苦難，太多的曲折，對此中國是抱有深切同情的。在支持和幫助第三世界國家方面，中國自身就經歷了諸多曲折⑫，此後終於認識到，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致力於國家發展，這便是改革開放開啟的背景。而在國際上，根據時任南斯拉夫常駐聯合國代表高洛布(Ignac Golob)所指出的：「現在執行聯合國的決議日益困難，甚至連那些一致通過的決議也是如此。……國際組織試圖進行談判並通過談判來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努力失敗了。」⑬之所以失敗，關鍵原因在於推動變革的力量不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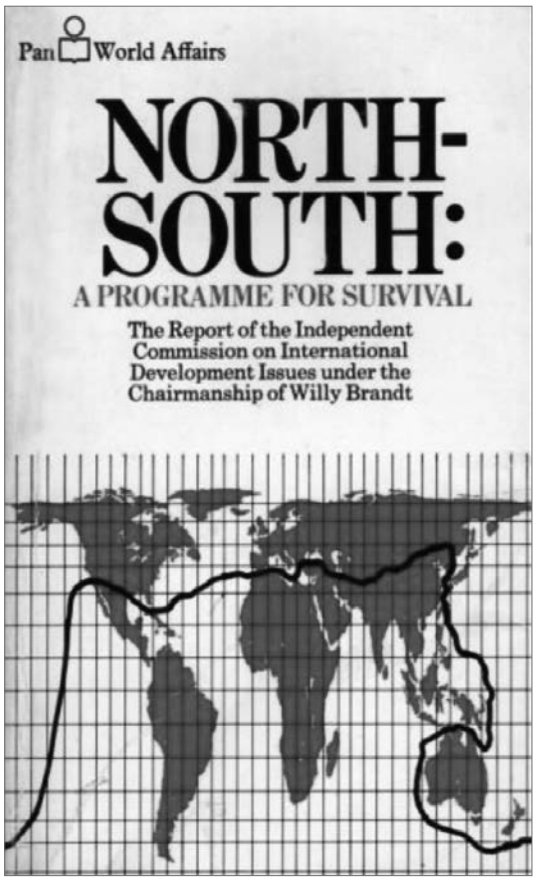
二 「第三世界」淡出，「發展中國家」登場

1976年，隨着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等領導人先後逝世，中國開始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經過1978年12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1979年1至4月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在思想解放過程中，一度被稱為「三個世界」的「理論」也引起了反思。在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常務副部長李一氓等引領下，相關部門重新進行了研究，反思的結果是決定棄用「三個世界」的說法⑭。作為這一決定的連帶效應，「第三世界」一語漸漸從官方話語中消失了。

中國的學術研究界則有所不同，大約在19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仍然繼續使用該詞，這並不是沒有理由的。首先，雖然「三個世界」的劃分存在不少問題，第三世界也未能成為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主力軍」，但它仍然是反對霸權主義、反對強權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其次，「第三世界」一詞已約定俗成，繼續沿用能為多數人接受⑮。但也有人認為，應根據新的形勢變化採用

更靈活、更有針對性的提法，可以變通地使用其他名稱如「南方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實際上它們與「第三世界」的基本內容是相同的。在純經濟問題上，可以稱某些比較落後的第三世界國家為「低收入國家」，而對某些發展較快的國家和地區則可稱之為「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等⑯。

改革開放的開啟也意味着中國對外政策的重大調整。1980年代，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多次講到，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發展問題。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⑰。這便是鄧小平的「東西南北」說。南北關係也是80年代國際學術界的熱門議題。70年代末，由來自不同國家的十八位政界、經濟界知名人士組成的國際發展問題獨立委員會（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ssues），認為改善世界範圍的南北關係已成為人類未來的一項關鍵性義務，這和擊退軍備競賽的威脅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是二十世紀餘下的年月中人類面臨的最大挑戰。由於該委員會由聯邦德國（西德）前總理勃蘭特（Willy Brandt）領導，因此通稱為勃蘭特委員會（Brandt Commission）。該委員會認為，有必要對建立一種適合所有國家的新型關係進行深入的重新考慮。如果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都相信有必要採取行動，就有可能在二十世紀內實現這種變革。經過數年的工作，勃蘭特委員會發表了一份題為《北方與南方：爭取生存的綱領》（*North-South: A Programme for Survival,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ssues*）的重磅報告，成為80年代各方廣泛探討南北關係的先聲⑱。



《北方與南方》封面劃定了一條南北國家的分界線。（資料圖片）

此後，又經過南方國家的知識界和政界領袖幾年的非正式討論，以坦桑尼亞前總統尼雷爾（Julius Nyerere）為首的南方委員會（The South Commission，後演變為設立於日內瓦的南方中心[The South Centre]）於1987年正式成立。南方委員會的目標是「幫助南方國家的人民和政府更有效地解決它們面臨的大量問題，自主地實現發展本國的抱負，並且更有效地改善其本國人民的生活和生活條件」，其所有建議的基礎是：南方發展的責任在於南方本身，並在於南方人民掌握之中⑲。這就有別於勃蘭特委員會所提議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通過談判或商談找到出路，而是認識到並強調南方國家要依靠自身的力量解決問題。曾任周恩來外事秘書的錢嘉東參加了這個委員會。根據南方委員會的報告，「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整體——佔地球陸地面積三分之二強——常被稱為第三世界」；「我們稱這些國家為南方」⑳。

與此相契合，1990年代這一發展趨勢轉變為探索「南南合作」，即南方國家之間的合作。通常所説的南南合作，其廣義概念包含雙邊合作和多邊合作，狹義的概念則特指多邊合作，多邊合作採取區域性和全球性合作的形式。南南合作關係涉及多個領域，但主要是貿易領域。南南合作有多種形式，最值得注意的是建立起各種合作組織，或曰一體化組織㉑。在這方面，東南亞地區各國的一體化合作，可能是最為成功的案例。

在這一過程中，「第三世界」作為一個術語仍在中國學術界被使用着，仍有學者以此為書名出版了重要著作㉒。政府系統的重要研究機構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2003年改稱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遲至2000年還成立了「第三世界研究中心」。但這一時期的官方話語以及由此而來的學術話語，已經愈來愈多地轉向使用「發展中國家」，「第三世界」作為一個名詞逐步淡出。

二十一世紀初中國外交布局可概括為三句話，此即「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後因多邊外交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又被加上了第四句，即「多邊是重要舞台」。此後，這幾句話就成為中國外交政策共識。據此，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在中國外交中具有基礎性的地位。在政策討論的研討會中，也常會有人提醒不要忘記發展中國家的重要性，實際上是要政策制定者注意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保持某種「平衡」。因此之故，2003年法國作為八國集團（G8）峰會東道國邀請五個發展中大國（包括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領導人出席與八國首腦的對話，實為中國所樂見，原因在於五個發展中大國一道出現，避免了過於突出某一國家。至2007年，中國領導人先後四次作為發展中國家代表之一出席與發達國家的對話，即「G8+5」對話。隨着2008年二十國集團（G20）峰會的誕生，這一機制方告終止。

在多年間，中國一直自我定位為「發展中國家」，也很重視維護發展中國家的權利和利益。中國在G20中就是如此。G20作為財長和中央銀行行長的對話協調機制創建於亞洲金融危機後，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G20被提升到峰會層次，中國、巴西、印度、印尼、南非、土耳其、墨西哥、沙特阿拉伯等發展中大國或新興經濟體的領導人應邀參加了華盛頓峰會，繼之又參加了倫敦峰會、匹茲堡峰會等，中國幾乎每一次都強調要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到2016年，輪到中國主辦G20杭州峰會。作為主辦國，中國擁有一定的自主權，決定讓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參與其中。當中國成為G20主席國時，峰會受邀嘉賓國中出現了老撾、乍得、塞內加爾、泰國、哈薩克斯坦、埃及等六個發展中國家。杭州峰會成為G20歷史上最多發展中國家參與的一次盛會，並首次將發展議題置於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中心位置，發布了〈二十國集團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行動計劃〉和〈二十國集團支持非洲和最不發達國家工業化倡議〉等。

中國還努力建立與發展中國家的合作機制，包括中國—阿拉伯國家合作論壇、中國—非洲合作論壇；又在上海建立了金磚國家（BRICS，即巴西、俄

羅斯、印度、中國、南非）共同倡議的新開發銀行，在北京建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向世界提出了全球發展倡議，還成立了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專司與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合作。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早在1970、80年代就已日益分化的發展中國家，其分化變得更為明顯。它們當中有些已經成為了新興經濟體。例如韓國作為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已加入被視為「富國俱樂部」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以下簡稱「經合組織」）。經過二十一世紀的頭二十年，從發展水平看，新加坡已進入了發達國家行列，印尼正尋求加入經合組織，巴西則於2019年在世界貿易組織（WTO）會議中宣布放棄發展中國家的身份。世界舞台上出現了由新興市場國家組成的金磚國家組織，也有一些國家跌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如阿根廷、委內瑞拉；當然仍存在靠借債度日的窮國。對於分化如此明顯、差異如此巨大的各國，是難以將它們作為某一類國家來看待、稱其為「一支」力量的，否則就會顯得大而化之、泛泛而論㉓。「全球南方」一語的出現，並沒有解決這一問題。

三 「全球南方」：新瓶舊酒還是舊瓶新酒？

多年間，至少從勃蘭特委員會開始，人們在使用「第三世界」和「發展中國家」的同時，就已經在使用「南方」和「南方國家」等語了。隨着時間的推移，「全球化」（globalization）成為了大勢所趨和主流話語，“global”一詞的使用愈益廣泛，成為了一個流行詞。在世界政治經濟中，新興經濟體及新興市場國家對全球政治經濟局勢的影響力日益凸顯，共同解決「全球性」的問題也不能沒有這些新興國家以及更大範圍內更多國家的參與。在此情形下，在“South”之前加上“global”，便是自然而然、順理成章的了。「全球南方」（global South）作為新語詞的出現，反映了世界政治經濟中的新趨勢。由於這一語詞產生於話語較為強勢的西方世界，也就很快地流行開來。所謂「全球南方」，大體就是指南方國家或發展中國家。

對中國來說，正如過去西方語彙或概念傳入時，中國均需經歷一個如何看待的磨合過程。首先，既然「全球南方」的所指與「發展中國家」的所指基本相同，加上中國自我定位為發展中國家，那麼中國自然就是全球南方的一員了。經過內部的研議，接過「全球南方」的說法是順乎自然的。其次，中國意識到有些外部力量似乎有意將其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甚至「離間」其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關係。因此，把這一說法接過來，再次明確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之一，也是全球南方的一員，是邏輯自洽的。鑒於鄧小平早就告誡過「不當頭」，也即不爭甚麼「領導權」，對於印度自2023年以來連續三屆主辦線上的「全球南方之聲峰會」，中國只是關注，未作過多表態。

80年代以還，中國也一直在使用「南南合作」概念，來指稱它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合作。從這一點看，中國始終將自己視為南方的一部分。比如外交部與聯合國駐華機構共同編寫的〈中國實施千年發展目標進展情況報告（2008年版）〉的「目標八：建立全球發展夥伴關係」部分明確闡述：「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不承擔目標八規定的對發展中國家援助義務，但中國始終把加強同發展中國家的合作作為對外政策的一個基本立足點。中國的南南合作形式多樣，涉及貿易、投資、技術等廣泛領域，是全球南南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自上世紀五十年代起，中國就在南南合作框架內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發展援助。近年來，隨着中國經濟實力的提升，援助的規模和範圍也逐步擴大。」㉔

隨着「全球南方」一說開始流行，很快地反映於中國領導人及高級官員的各種講話中。僅以2024年為例：

9月5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開幕式上的主旨講話中，稱「中非共逐現代化之夢，必將掀起全球南方現代化熱潮」。

10月24日，習近平在俄羅斯喀山金磚國家領導人會議上的講話，稱「全球南方」群體性崛起，是世界大變局的鮮明標誌。講話並把金磚國家視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陣。

11月11日，習近平向在巴西舉行的全球南方媒體智庫高端論壇致賀信，稱中國始終是全球南方的一員，永遠屬於發展中國家。

11月18日，習近平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出席G20領導人第十九次峰會時，稱「中國始終是『全球南方』的一員，是發展中國家可靠的長期合作夥伴」。

在2025年新年賀詞中，習近平在回顧過去一年的工作時，把「深化全球南方團結合作」包括在內。

中國還聯手其他一些全球南方國家，就重大國際問題集體發聲。2024年9月27日，全球南方部分國家的外交部長和高級代表在第七十九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期間舉行會議。會後，阿爾及利亞、玻利維亞、巴西、中國、哥倫比亞、埃及、印尼、哈薩克斯坦、肯尼亞、墨西哥、南非、土耳其、贊比亞等國就烏克蘭危機發表了聯合公報，並決定指示這些國家的常駐聯合國代表成立「和平之友」小組。12月23日，烏克蘭危機「和平之友」小組在紐約再次舉行會議，中國、巴西、阿爾及利亞、南非、土耳其等十七個全球南方國家代表與會。會議積極評價9月部長級會議及聯合公報，強調聯合公報是全球南方國家首次在烏克蘭問題上集體發聲。

儘管以上是不完全統計，但已經可以說明中國明確擁抱「全球南方」一語，把「全球南方」這一新名詞與使用了多年、人們已經習以為常的「發展中國家」一語並用。此外，一般是在面向這一類國家時使用「全球南方」，也通常是在多邊場合下使用，而就既定政策而言，並未有甚麼改變。比如在G20峰會上，始終強調要增加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和代表性，按照各方商定的時間表

和路線圖，開展世界銀行股權審議，推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份額佔比調整，等等。

然而問題在於，全球南方各國間差異很大，如前所述，有些國家發展得較好，已經成為新興經濟體。成立於1961年的經合組織被視為一個「富國俱樂部」，現在已經擴大到三十八個成員國，但只有兩個是亞洲國家，即日本和韓國。如果印尼申請成功，將成為首個加入這一組織的東南亞國家。

曾經是G8之一的俄羅斯，它在全球南方中如何定位，始終是一個涉及其特殊身份的棘手問題。它曾經是第一世界的兩雄之一、超級大國蘇聯的主體，雖早已今非昔比，但仍可算大國，因此內心並不願被視為南方國家。此外，當年的「第三世界」和今天的「全球南方」都是反帝反殖的，而俄國歷史上長期奉行典型的帝國主義，蘇聯時期也不例外。由於俄羅斯是金磚國家成員國之一，因此金磚機制是否算「南南合作」，是否全球南方的重要合作機制、組織或集團，就多少顯得有點尷尬。2024年1月1日，金磚機制第二次擴員生效，埃及、阿聯酋、伊朗、埃塞俄比亞正式參與金磚國家合作，「大金磚合作」時代由此開啟。與此同時，2024年俄羅斯任金磚主席國期間，金磚夥伴國工作也得到推進。各方於該年底確定九國為金磚夥伴國，包括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白俄羅斯、玻利維亞、古巴、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烏干達，並於2025年1月1日正式成為金磚夥伴國。1月6日，金磚機制主席國巴西發布新聞公告，宣布印尼成為金磚正式成員。

「全球南方」問題在學術界也引起熱議，一種看法認為「全球南方」是一個非常含混的概念，它是極其鬆散、無法構成集團且尚未發達的國家的總稱；這些國家是相對於大多位於北半球的發達國家而言的。它們當中有一些新興經濟體，二十世紀末以來經濟快速發展、主要以工業化為標誌、現代化水平正在接近原北方工業化發達國家，如韓國、新加坡、以色列等；它們的身份較為模糊。全球南方還包括一定程度上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或者說進入了中等發達國家行列但艱難前行的一些國家，它們當然有別於還停留在欠發達或不發達狀態的國家。根據世界銀行2023年的數據，巴西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約為1萬美元，而非洲國家塞拉利昂則遠遠落後，約為750美元，正好說明這些國家之間在發展程度上的嚴重分化。

四　新的「三個世界」說

2024年初，美國知名學者、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艾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發表〈三個世界：西方、東方、南方及塑造全球秩序的競爭〉（"Three Worlds: The West, East and South and the Competition to Shape Global Order"）重頭文

章，把世界劃分為「全球西方」(global West)、「全球東方」(global East) 和「全球南方」，由此提出了新的「三個世界」說。其中，全球西方以美國和歐洲為代表，全球東方以中國、俄國為引領，其他國家均歸為全球南方，印度、巴西等國是其代表。把世界劃分為三個陣營，代表了美國尤其是其建制派一種新的戰略思維動向，歐洲人的看法則與此驚人地相似，可見它屬於西方世界的一種戰略思想，頗值得關注和重視㉕。

新的「三個世界」說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把中國從全球南方中剝離出來，並將中俄捆綁在一起，以「全球東方」名之。早在2017年12月特朗普(Donald J. Trump) 第一任期政府發布〈美國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報告時，就已把中俄「捆綁」，視它們為「修正主義大國」(revisionist powers) 和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2022年2月俄烏戰爭爆發後，中方並未選邊站隊，但在西方國家眼中，中俄站在一起似乎得到了「證實」。現在艾肯伯里進一步提出「全球東方」一說，是這一捆綁論的新發展。雖然艾肯伯里沒有明言其中是否包括伊朗、朝鮮等國，但恐怕已隱含其中。新的「三個世界」說的四個主要觀點是：

第一，全球秩序鬥爭的主軸在全球西方和全球東方之間。全球南方的力量則相對較弱，是一個多元化的發展中國家群組，成員大部分處於世界的邊緣。

第二，全球東方為全球南方國家示範了一條發展道路。中國的成功向其他貧困國家展示了一條有特色的發展道路。與此同時，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日益增長的貿易和投資來源國。全球南方與中國有着廣泛的經濟合作。

第三，全球西方也有着很強的吸引力，歐美國家仍然是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強大的國家，仍然是戰後自由世界秩序的核心支持者。更重要的是，全球西方是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倡導者。此外，美國在向全球南方國家提供安全援助方面也處於不同尋常的重要地位。

第四，全球西方和全球東方都有動力擴大各自的國家集團，向全球南方的「搖擺國家」發出合作信號。首先，中國和美國將愈來愈多地尋求與全球南方的關鍵國家建立合作；其次，中美兩國為了獲得更多的支持，需要並將愈益向世界展示其作為全球大國的領導能力；最後，全球西方和全球東方之間的競爭將對全球秩序的基本規則和規範產生影響。在可預見的未來，全球政治的「三個世界」可能會長久存在，並產生衝突與合作的互動機制，從而重塑國際規則與國際制度㉖。

新的「三個世界」說，劃出了一個以中俄為領導力量的全球東方，並將它置於全球西方的對立面，政治色彩和貶抑色彩極為鮮明，實際上是把它們視為兩個陣營，認為它們各自展開了對全球南方國家的爭奪。如此論說，就好比冷戰時期美蘇分別爭奪第三世界一樣，其潛台詞呼之欲出，準冷戰思維是十分明顯的，也是非常有害的。

五　結論

從「第三世界」經「發展中國家」到「全球南方」，是一個用語變化的過程，也反映出中國對外政策的某些微妙變化。改革開放的開啟是中國內政外交的一個分水嶺，是從堅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邊反帝反霸，戰略性地轉變到務實的、以現代化建設為中心的對外政策。在用語上則反映為逐漸棄用「第三世界」，而基本採用了「發展中國家」一語。在身份認同上，中國始終認為自己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這其中既包含發展水平的涵義，也包含政治涵義。在世界事務中，中國則常常持支持發展中國家的立場和態度，把與這些國家的關係視為自身對外政策的基礎。

「全球南方」是新近興起的關於發展中國家的一種新表述。它是從「南方」和「南方國家」演變而來的自然發展。由於它產生於話語強勢的西方，加上傳播速度迅速，必然會產生如何看待這一概念的問題。中國視自己為當然的全球南方一員，常常同時使用「全球南方」和「發展中國家」兩個用語，有時也分別使用。如果說術語上的使用還是比較表面的話，那麼中國對全球南方和發展中國家的自我認同是更為深層和基本的，這一認同也反映在中國的對外政策立場和措施上。問題在於，全球南方包括如此之多的國家，彼此之間差異如此之大，並且已經發生了種種分化，需要分辨不同情況對它們作出不同甚至各自的處理。作為一個通行概念，將中國籠統地表述為「南方國家」或「發展中國家」並無不可，但在實際操作中，「全球南方」是難以作為同一類國家並大而化之地處理的。

因此之故，籠統地提「全球南方」或「發展中國家」很多時候未必適當，需要分辨情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應一概而論。比如菲律賓，雖然與中國同為全球南方國家，其所思所想卻可能與中國南轅北轍。這就要求我們對每一個國家都要進行細緻深入的分析和把握。這正是近些年在中國受到高度重視、正在蓬勃興起的區域國別研究的職責所在。

註釋

① 一般認為，美國知名國際關係學者福克斯最早在1944年首創了“super-power”這個詞，後來連字符被省略，成為人們熟知的“superpower”，即「超級大國」。參見William T. R. Fox, *The Super-Powers: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44)。

②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頁13。

③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二卷，頁601-602。

④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頁364。

⑤⑮ 陳雪英：〈如何看待第三世界已經「滅亡」的論點〉，載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編：《90年代的第三世界》（北京：時事出版社，1992），頁130；133。

⑥㉕㉖ 參見G. John Ikenberry, "Three Worlds: The West, East and South and the Competition to Shape Glob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100, no. 1 (2024): 121; 121-38; 121-38。

⑦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頁520-21。

⑧ 武市紅、高屹主編：《鄧小平與共和國重大歷史事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頁107。

⑨ 參見任曉、劉慧華：《中國對外援助：理論與實踐》(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尤其第四章。

⑩ 埃切維里亞(Luis Echeverría)、米尼奇(Miloš Minić)著，可大安等譯：《不結盟國家面臨挑戰》(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5)，頁4。埃切維里亞是墨西哥前總統、時任第三世界經濟和社會研究中心主任，米尼奇為南斯拉夫前外交部長。

⑪ 米尼奇著，謝沛江、張志紅譯：〈不結盟國家與國際經濟新秩序〉，載《不結盟國家面臨挑戰》，頁26。

⑫ 有一本英文著作*Inside the Third World: The Anatomy of Poverty*的中譯名很能反映這一點，參見哈里森(Paul Harrison)著，鍾菲譯：《第三世界：苦難．曲折．希望》(北京：新華出版社，1984)。在經歷了諸多的苦難和曲折後，最後總還是要抱有希望的。

⑬ 高洛布(Ignac Golob)著，賈惠芳譯：〈不結盟和聯合國〉，載《不結盟國家面臨挑戰》，頁42。

⑭ 參見何方：《論和平與發展時代》(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頁47-48。

⑯ 參見〈「90年代的第三世界」學術討論會紀要〉，載《90年代的第三世界》，頁434。

⑰ 鄧小平：〈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1985年3月4日)，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105。

⑱ *North-South: A Programme for Survival,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ssues* (London: Pan Books, 1980)；中文版參見趙煜等譯：《爭取世界的生存——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經濟關係研究》(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1)，頁2-4。

⑲ 尼雷爾(Julius Nyerere)：〈序言〉，載尼雷爾著，張小安等譯：《對南方的挑戰——南方委員會的報告》(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1)，頁v-vi。

⑳ 尼雷爾：《對南方的挑戰》，頁1。

㉑ 李琮：《第三世界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頁414-15。

㉒ 如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曾召開數次學術研討會，並以此為基礎出版了「第三世界研究論叢」，其中包括《美歐日與第三世界》(北京：時事出版社，1991)、《90年代的第三世界》等。又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資深學者李琮撰寫了《第三世界論》，暢征、陳峰君主編了《第三世界的變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等。

㉓ 比如，下面的說法就未免有點不切實際：「『第三世界』惟有加強內部合作，以一個聲音在國際舞台上說話，參與國際新秩序的建設，『入字當頭，立在其中』，真正起到戰略力量的作用。」參見陸忠偉：〈序〉，載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第三世界研究中心：《當代第三世界透視》(北京：時事出版社，2001)，頁3。

㉔ 轉引自程誠：〈中國特色的官方開發金融——中非發展合作的新模式〉，載鄭宇、李小雲主編：《國際發展合作新方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頁8。

任　曉　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